

临邑党史资料

第五集



中共临邑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日

汇编小引

统一战线，历来是我党我军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解放前，原德平县有一股被封建地主势力控制的土顽武装，其开始被国民党鲁北（亦称冀鲁边）总司令韩警砭收编为第七支队，后又被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改编为山东省独立保安第五旅。曹镇东曾先后任该旅正副旅长，故而被当地传称为曹五旅。正因为曹五旅是一股较大的土顽武装，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党我军便把曹五旅视为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其与我一起抗日的对象。由于德平县于一九五六年撤消，贯通德平县南北的中心区域划入我县，上级党史部门便把征集编研我党我军对曹五旅开展统战工作专题资料的任务交给我们。为此，将已征集到的资料汇编于此集，作为广泛征求意见和探讨的基础资料。

从已得资料看出，“七·七”事变前，原德平县城内有保安队、公安队。此外，各区乡农学校都有持枪的训练队，还有联庄会的组织。“七·七”事变初期，德平县的上层人物，以协助政府抗日的名义组织了抗敌后援委员会，应承抗战后勤任务，徐仲阳充其主任之职。当日寇入侵德州时，从属于国民党的德平县长贾文治闻讯逃之夭夭，德平县一时处于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此刻，徐仲阳会同曾任德平保安队长的曹镇东，把德平县内各色各样的武装力量集于他们之麾下借以支撑门面。不久，徐、曹率乌合之众投靠国民党鲁北总司令韩警砭的膝下，被编为鲁北第七支队，徐仲阳任支队司令，曹镇东任副司令，仍活动在德平一带。期间，惠民号称国民党山东省第五区专员的刘景良，欲将徐、曹之部收编为自己的从属部队，虽被徐、曹拒之门外，但徐、曹又感到势单力薄难以力敌，又苦于与韩警砭失去联系，于是徐、曹便先后同吴桥的张国基，德县的李玉双，陵县的于治良，宁津的张立

志等地方武装头目联系结成同盟，并组成了联合抗日同盟军。收即联合抗日又拒刘景良吞噬之效。徐仲阳任同盟军的司令，将徐、曹原部改为同盟军的第十支队。曹镇东即是同盟军的副司令又是第十支队的司令。至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曾国华、孙继先率领着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到达陵县境内的神头时，徐、曹闻讯派员前去迎接，并在德平城内举行了双方高干联欢晚会。当时徐、曹表现出依靠我军的**神色**，我军在统战原则指导下，为达**联合抗日**之目的，争取徐、曹之同意，便将同盟军的第十支队改编为从属我军指挥的洛阳支队，随之，通过我地下党组织，派丁学风同志到洛阳支队开展工作。延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肖华同志率延安支队到达乐陵，建立抗日根据地，曹镇东统辖的洛阳支队，进一步向我军靠拢，双方关系趋向密切发展。曹镇东一方面欢迎我军派杨忠同志为我党代表，同时也将杨忠同志带领的一批干部，分派到各连当指导员。另一方面抽调他的属部一部分人员分批到我军创办的乐陵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同时把我军派驻的李青山同志任命为一团团长，将姚金符同志任命为一团政治主任，并公然宣称一团为曹部之模范团。由于我党我军顺势利导地开展统战工作，曹之属部经我军派驻干部的改造，其军事素质和抗日情绪都较前有所提高。这期间，曹部配合我军袭击德平城内、桑园车站的日寇，攻打沟店铺边临镇、宿安街敌伪军据点和破坏津浦铁路，中断日伪交通干线的活动。一时之间，曹部成为抗日力量的一翼，其本部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曹部处于“黄金时代”（亦称极盛时期）活动于周围十几个县。这就是我党我军与曹部开展统战工作的一大成果。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领卒由鲁西（聊城

一带)窜之德平。在德平城内西南角大广场上开会宣称“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论调。徐、曹则又把沈鸿烈视为正统所属，完全听信了沈鸿烈的摆布，取消了我军编定的洛阳支队番号，接受了沈鸿烈改编的国民党山东省独立保安第五旅的番号。沈鸿烈并任命徐仲阳为五旅旅长，曹镇东为副旅长，董静亭为参谋长兼德平县长。自此，徐、曹、董便投靠国民党，而对我党我军逐渐貌合神离了。继沈鸿烈之后，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由惠民来德平，在城后郭家对五旅进行检验，并对其部队编制做了调整，曹镇东也乘机将自己的亲信提拔为大小不等的头目。这正是曹五旅处于徘徊于国、共两党之间，脚踏两只船的阶段。然其走下坡路的征兆则日益显露。因此，这期间德平之外的商河、临邑、陵县出现了抗日政权、五旅组成的第二政权、敌伪政权三分鼎足的局面。

一九三九年，沈鸿烈又将张光弟、靳文元派到曹五旅。张光弟以国民党山东省保安司令部科长的身份自居，想在五旅身居要职。曹镇东生怕张光弟夺其军权，开始给张光弟安排了个参谋长^兼名誉职位，不久便令其和陶景惠去负责五旅组办的军事训练班(培养兵骨干)工作。恰巧给张、陶之流提供了散布和灌输曲线救国反动思想^带的场合。五旅之素质趋向反动，但表面上尚能与我军联合抗日。国民党省府为使曹五旅脱离与我军接触，又为避徐、曹与刘景良的前嫌，便把原第五专区的德平、德县、陵县、临邑、商河、乐陵另划为第十五专区，命徐仲阳为专员兼保安司令，曹镇东为保安副司令兼五旅旅长，张光弟为副旅长。此时，曹五旅忠于国民党的思想和行动已根深蒂固，与我军疏远的行为日趋明显，已转化到难以被我军争取的地步。于一九三九年底，我党我军决定，先后将派驻五旅的杨忠同志和其他干部撤出。

一九四〇年，曹五旅已完全摆脱我党我军之控制，便公开与国民党鲁北行署的何思源及惠民第五专区的刘景良部同流合污。不过，此时何思源、刘景良集结于惠民以东地带，与日寇和平共处（实是降日求和）。但五旅还能不同程度的对日反击。于是日寇加紧了对曹五旅的围剿。何、刘亦不派兵增援曹五旅。这期间，曹镇东之盟弟^{宋达民}已在吴桥率卒投敌。五旅一团团长吕耀南被日寇俘虏。正当曹五旅陷于完全孤立之际，刘景良派人来劝五旅降日，加之以降日的宋达民和被日寇放回的吕耀南亦对曹镇东施展降日的伎俩，与此同时，曹五旅接到了国民党山东省府“宁降日寇，勿亡共党”的密令，于一九四〇年底，曹五旅停止了对日的敌对行动，集结于德平城西茄子里村苟延残喘，预卜采日之命运。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日寇据曹五旅安兵不动的状况，其旅团长林芳次郎派其参谋左滕常古川及武定道顾问朝仓来德平诱降曹五旅。曹镇东应邀到德平城内赴会，继而随诱降的日方代表到惠民与林芳次郎接触。林芳次郎向曹镇东提出了三条诱降条件：①五旅接受日军改编共同防共 ②五旅停止搞地方政权的活动 ③日军按日拨给五旅军饷等等。曹镇东在惠民允诺了林芳次郎的条件之后，返回茄子里对自己的部属作劝降工作。五旅的下层带兵者和士卒大部是德平的房檐兵，都不愿意远离家乡去为日效劳。曹镇东一方面召开连以上头头会议，灌输降日思想，一方面在士卒中游说，散布“投日尚存，投共必止”的谬论，并声言：“此次投日系应付一时之手段。”经过曹镇东对士兵一系列的劝降活动，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公开率部投敌。五旅投敌后，我党建立了鲁北办事处（李玉池任主任），仍以统战方式与五旅联系，这期间也把五旅内部分不赞成抗日的青年学生争取到

我们的队伍中来。

一九四一年底至一九四二年初，曹五旅被日寇改编为武定道剿共第三旅。自此，曹五旅助纣为虐的行为越演越烈。开始其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茄子里一带，令各团、营在德平周围的台子刘、孙伯言村、朱阁二庄、林家屯、狄家、娘娘庙、陈家、郭家、果园、崔马赵、大客家十几个村庄安设了据点，强迫老百姓挖沟、修岗楼，干了不少为敌效劳的勾当，成了我党我军开辟德平工作的一大障碍。一九四二年秋，曹镇东受沧县大汉奸刘佩臣的教唆，充当了日寇的皇协护民军司令。不久，曹镇东奉日寇之命，派张光弟带领一、四、五三个团，由德平去垦利会同日寇袭击八路军。结果其一团被我军击溃，四团半途折回，五团全部逃散，曹部人员、枪枝大减。曹镇东吃了苦头，将所剩兵卒收集起来，将剿共第三旅更换为自卫团的旗号，曹镇东自封为总团长，下设分团和中队。但是，日寇紧抓住曹部不放，于是又给了曹镇东一个武定道参议员的头衔，继而将其部队改编为警备队，并令张老十（绍臣）、霍荣青各带部卒分驻临邑和陵县，其余由曹镇东带领驻扎在德平县内，但其人马越来越少。由于曹五旅之投敌得到国民党山东省府之默许，所以这期间曹镇东唱着曲线救国的双簧戏，仍与国民党山东省府保持着联系。在国民党山东省府整编全省保安队时，先后又给曹部命名为山东保安第十旅和第十三旅的番号。此时曹部身上长着伪军和国军两个脑袋，这种嘴脸一直摇晃到一九四三年夏末。

一九四三年秋，日寇突然向曹镇东追索过去被五旅在杨家桥缴获的机枪。曹镇东感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开始产生了摆脱日寇控制的念头。他给驻在郭庄据点的邢同春下了个秘旨，令其^{带领}人马离开据点，自行活动。邢同春对曹镇东的旨意心领神会，可巧，在邢同春带着部

卒开展游离活动之际，得知驻褚集日寇换防的消息，乘机在郭家桥上对换防的日寇进行阻击，毙敌数名，得军资一部，战后同部下一起逃至他乡。与此同时，曹镇东、董静亭也领着部下离开了茄子里，流窜于河北省境内。这便是曹镇东演奏的一段离日插曲。铁杆汉奸张老十，被日寇从临邑调至德平，填补了曹镇东留下的空白，当了德平的伪县长。

一九四四年一月，曹镇东带部卒返回德平境内褚集驻扎。一月八日被日寇包围，曹镇东被日寇虏去押解济南，名义是住院，实质是关押。（董静亭、张光弟因有事未在曹部未当俘虏）。七月间，曹镇东死于济南（死因传说不一），曹之遗军分化为两大派。一是以董静亭、张光弟为代表的抗日派，主张重整旗鼓，抗击日寇。二是以张老十为代表的亲日派，甘心当日寇的哮天犬。至此，曹五旅已趋于土崩瓦解之边缘。

自曹镇东死后，五旅之军权落于张光弟和陶景惠之手。张光弟是外将派，陶景惠是国特派，他二人合起手来排斥五旅的元老派。董静亭在阜阳国民党山东省流亡政府的驻地，看到了蒋政权的腐朽末日，回来后又受到张、陶二人的排斥，他预感到只有投靠共产党八路军才有出路。一九四五年春，八路军解放了德平城，张老十带妻小及部属逃往商河。五旅的人马形成了董、张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九四五年七月，张光弟在周家坊子发动哗变，带着邢同春等四个小头头及其部属流窜到宁津投靠日寇，也就是张光弟二次投敌。同时，董静亭也带着李伯哲等六个小头头及部属投靠共产党八路军，被编入抗日政府县长靳兴候同志率领的鲁北支队。五旅已完全肢解。

张光弟二次投敌月余，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共产党领

导全国人民进行的八年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而张光弟仍带部属随已投降交械的日本败兵经连镇转入德州，奉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之命，加入了蒋、敌、伪合流的大杂烩队伍，继续反共反人民，并不断派遣特务，还乡团来德平干些杀害人民，涂炭生灵，抢劫财物等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直到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我军解放德州，张光弟、陶景惠束手就擒。五旅以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而生，以反共反人民告终。其存在八年多的时间，抗日——降日——加入蒋、敌、伪合流而覆没。这就是它的全部历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我军对曹五旅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五大成果。一是曾国华同志领导的抗日东进挺进纵队，及时地将五旅改编为从属我党我军指挥的洛阳支队，壮大了当时的抗日力量；二是我党我军向曹部派驻干部即改造了五旅的素质又稳定了其抗日情绪；三是五旅投敌后，我们建立了鲁北办事处，仍不同程度的与五旅的士兵取得联系，能随时随地的把一些进步青年积极分子介绍到我党领导的部队中来；四是欢迎五旅派人到我军创办的乐陵军政学校学习，增强了五旅的进步素质，也为分化瓦解这支土顽武装奠定了基础；五是欢迎董静亭率部向我党我军靠拢，加速了五旅的肢解，削弱了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党羽。如果当时我党我军通过工作使曹五旅抵制沈鸿烈的改编，或肖华率部挺进鲁西时能将五旅带走，则统战效果会更好些。

——编者

目 录

我们改编曹五旅的前前后后

我们改编曹五旅的前前后后.....李 平(1)

谈谈我军最后改编五旅的情况.....李玉池(9)

我在德平临邑工作期间一段情况的回忆.....丁学风(23)

杨鸿耀同志的来信.....(44)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前前后后.....阎宗威(49)

关于曹五旅情况的拾零.....(57)

我所了解的曹五旅情况.....李俊峰(69)

一份有关曹五旅内幕的材料摘编.....(77)

曹五旅概况索编.....(84)

敌。对付刘景良。可是以后又由山东省国民党主席沈鸿烈把他们统一起来了。原来曹镇东和刘景良是敌对的。刘景良主要以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在鲁北要统一他（曹镇东的部队）。也就是要消灭他。听从刘景良的改编。

下面再说刘景良这个人。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他是韩复榘部队一个团里的副官。那么五旅的徐仲阳、董静庭、张光弟等人都是些知识分子。刘景良这样打国民党的牌子要搞统一，他们是看不起他刘景良的。五旅和刘景良是敌对的，所谓盟军，就是曹镇东和张国基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景良。那么刘景良和我们党掌握的邢仁甫三十一支队又是死对头。我们的部队和刘景良曾打过几次仗。李启华同志就曾被刘景良俘虏过，最后在交换俘虏时交换过来的。还有一次战斗，是杨青

我们改编曹五旅的前前后后

(据李平同志的谈话录音整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作为一个开场白来讲嘛，曹五旅的性质，简单地说，是一个土顽组织。他的队伍共五千余人，也就是四、五千条枪。

(一)

下面咱就说曹五旅与我们建立关系的前后，曹五旅和我们建立关系以前，叫同盟军。八路军东进纵队来了之后，五旅正式与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一直到改编为洛阳支队，这就成了八路军了。这是在我们统一战线的原则下，肖华、符竹庭亲自联络并掌握的。那么这个部队在我们东进纵队没来之前呢？他是同盟军，准备在乐陵和邢仁甫领导的救国军（也就是我们以前的小八路）会师，和我们搞联盟共同对敌。对付刘景良。可是以后又由山东省国民党主席沈鸿烈把他们统一起来了。原来曹镇东和刘景良是敌对的。刘景良主要以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在鲁北要统一他（曹镇东的部队）。也就是要消灭他，听从刘景良的改编。

下面再说刘景良这个人。他不是个知识分子，他是韩复榘部队一个团里的副官。那么五旅的徐仲阳、董蔚庭、张光弟等人都是些知识分子。刘景良这样打国民党的牌子要搞统一，他们是看不起他刘景良的。五旅和刘景良是敌对的，所谓盟军，就是曹镇东和张国基等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刘景良。那么刘景良和我们党掌握的邢仁甫三十一支队又是死对头。我们的部队和刘景良曾打过几次仗。李启华同志就曾被刘景良俘虏过，最后在交换俘虏时交换过来的。还有一次战斗，是杨靖

远带兵和刘景良的部队打的，把刘景良后方司令部的参谋和一些高级人物全部俘虏了，这样刘景良才服输了，刘景良和我们是死对头。这个时候沈鸿烈就开始掌握刘景良了，随后又到乐陵找到他的县长牟宜芝和我们搞磨擦。这里还涉及到曹五旅的问题。在三八年底和三九年春，曹五旅和刘景良虽是敌对的，但和我们还是搞联盟的，也就是和邢仁甫的三十一支队搞联盟。这是个基础。所以我们的东进纵队过来后，也必然联合曹五旅。那时六旅还没有成立起来，刚有点初型，曹五旅活动的早一点。这就是说日本鬼子沿着交通沿线南下的时候，后方呈现无政府状态，曹镇东就起来了。他组织的这些人主要是德平这一带的。开始和刘景良敌对，好象是和我们好一点。

再一个是二路张国基和曹镇东就不同了，那个宋达民我们以后弄清他是个托派。托派是以左的口号言论以共产党面貌出现，在暗中捣鬼搞破坏，宋达民就是这么个人。宋达民是留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和曹镇东常来往也熟悉，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和刘景良不同。假如说，开始里边有些进步倾向的话，那么这又是一种因素。所以三八年冬东进纵队到鲁北之后，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曹镇东他们这一大股，搞成了统战关系，把曹的部队编成了洛阳支队。

(二)

再谈一下五旅投降日寇的情况。肖华东进纵队走了以后，五旅就变化了。因为他变成国民党掌握的部队了。沈鸿烈已经把他们收编了，在鲁北还有六、七、八旅，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了。这时他们在国民党的指挥下，对我们就有统一的行动和步调了，共同来反对共产党。到了四〇年形成了反共高潮。“皖南事件”新四军军部被包围。这里有个事情也惊动了他们，那就是张国基二路的消灭。一九四〇年八月

十五日正是我来二地委的时候。以前我在无棣那边就听说要消灭他，因为我们一地委的马振华是被他们打死的，王俊峰也是被他们害的，宁津一带我们的一些县委书记和县长，区长被他们打死的也不少。比曹五旅反动，曹五旅还没有公开大搞我们，有时偷偷的搞我们一下。二路张国基，他是曹镇东同盟军的一部分力量，也算个主力吧，尤其是他们紧靠着经常来往。没有消灭二路之前，五旅和我们友好的那个阶段，我们经常住在一块，他并不是时刻警惕我们，防备我们。那么到了消灭了二路之后，曹五旅就不行了，从表面上看，关系还不算太紧张，但是他们对我们的行动和驻防就开始有所提防了，宿营的驻地他们是尽量离我们远一点，就不靠我们了，因为他害怕我们。他们怕咱怕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记的是四〇年八月十五后，地里的庄稼基本上没有了，各村里的柴禾、棒子秸到处是一垛一垛的。曹的部队无论住到哪里，都叫老百姓把棒子秸全部搬出来，围在他住的这个村周围，他主要是怕我们的部队来收拾他，他把这些东西作为报告他的信号，他怕咱就到这个程度。有一次二地委行政秘书徐振国和咱们的一个交通科长王前进，还有个通讯员，他们三人出去执行任务。晚上走到德州九区董家苔一带，这个时候五旅住在这里，徐振国和王前进走到村边，王前进走在前边，快进村子的时候，就踩到棒子秸上了，这样就有动静，五旅岗哨听到动静就问，是干什么的，王前进这个人是个傻大胆，满不在乎，还是往前走，徐振国就喊他，“王前进王前进”五旅站岗的听见了，以为是八路军的大部队来了，就赶紧报告，他们的部队呼啦的一下子全都下跑了。实际我们只有三个人，实际是咱们的交通科长的名子叫王前进，敌人听的是，我们命令部队“王前进”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真是怕我们怕到极点了。这是

一个方面。这时他还没有公开和我们对着干，他也要考虑对我们下手的话。我们就要消灭他的。因为咱们消灭了二路给曹五旅敲了个大警钟，他就开始警惕我们了，这时我们的人还在里边没撤出来，那么以后我们就逐步撤出来了。其原因就是咱们把二路消灭了，他们的行动及各方面和我们就开始疏远了，逐步开始反动，我们撤出来的时间，这个李玉池同志谈到了。咱们在他里边整个时间不算太长，后来不撤也不行了。我们撤出不久五旅就投敌了。

总之，曹五旅和六旅张子良不同，我们在对五旅这个问题上有点失策。由于没抓紧机会把五旅搞到我们这边来，叫他跟肖华到鲁西去，而留下了后患。

(三)

下面说说曹五旅对我们的危害。话还是这样讲，假如曹五旅我们抓紧他，带着他一直进步下来，二军分区也好，临邑也好，形势都不会恶化到那个程度。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曹五旅的转好与变坏所决定的问题是什么。咱先说临邑形势的恶化，一个是汉奸的问题，临邑的土匪是比较多的，于新岭、何狗子、袁光正、张五星子、许兆贤等多得很。商河田三秃子千八百人。东南角上还有白杨匪团。商河南部就是八路李光明。陵县的于志良。曹下边控制的也有不少土匪，如张老十等人。曹五旅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这些人。这些东西他们是要依靠曹的，在这些土匪中他们把五旅、六旅看作是正统的东西。他们这些人看谁是正统，就靠谁。在我们这个地区五旅是这些土匪杂团的主心骨，他的好坏是直接影响咱们这个地区的形势好坏。我们仔细分析当时这个地区形势恶化是与五旅转变分不开的。至于我们杀人多一点，有点左倾，那不是根本问题，关键还是与五旅有直接关系。假

如说没有五旅或把五旅改编成我们八路军[✓]变成进步的，大部分兵源又是德平的，那么我们这个根据地多牢固呀！再说我们的力量也增大了，只要我们牢固地占领这个地区，临邑的汉奸也是不会那样猖狂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对比的分析，当然没成事实，但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曹五旅以后被鬼子拉过去了，在德平南边八里庄呀，还是什么村子，正式投降了。实际在这之前他就开始倒了，反动了，就按照国民党沈鸿烈反动政府的指示办事了，在临邑等地设二政权。临邑二政权的县长叫郭绍贤，我见过他。开始徐尚武和他会谈，他装作友好，在台子刘一带我们和他见过面，是徐尚武把他弄来的，这是四一年春天，徐县长还没有挂花。五旅那时还没公开的和我们闹磨擦，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不设政府，德平我们就没有设，但是有靳兴侯带一个支队三四个连在那边活动。因为那时就是五旅的部队也可以到我们地区来活动，我们也不限制他。自消灭二路之后，他们与我们的磨擦就厉害了，二政权在临邑设了县长叫郭绍贤，他在临邑杀了我们好多人。这个二政权有时就伸到我们的驻地来征粮，当时我们的根据地他们来征粮是不允许的。霍荣青当时是临邑的伪政权，郭绍贤是二政权，加之我们的抗日民主政权，这不是三角斗争吗？到后来我们的根据地就失掉了，他们也就投敌了。

(四)

我再说一下关于在改编五旅中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肖华南下时，在我们内部传出曹镇东要跟肖华南下的消息。当时说为了怕影响统一战线问题，没把他们带走。洛阳支队是我们的队伍，没带走就应该发给“八路军”的符号，叫每个战士佩带上。那时东进纵队是“大八路”，我们的救国军是“小八路”，也就是字大和字小

的区别。反正都是八路。那时我们不是十八集团军嘛。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承认的，只要发了符号就是八路军的洛阳支队了，沈鸿烈再来了他不就难办了吗？他就不敢动了，再来人他就得和我们东进纵队联系才行。这不是你国民党派来的牟宜芝（三年乐陵的国民党县长）。再说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派杨忠同志住在里边，时间虽然比较短，还得做我们部队的工作。但作为代表杨忠同志，在里边积极的活动，五旅的工作就比较熟了，另外我们也派进了其他同志，如李青山、李玉池等人。总起来说，五旅当时能和我们一道抗日这个问题是内外因相结合，内因就是曹五旅上层领导里边有进步的，也就是说倾向我们的，也就是左派否则他们是不会这样干的。根据这一点就说明了在鲁北与曹镇东这个土顽部队讲统战是右倾的。这一点我们失招。再就是他被我们改编后，愿意跟我们部队南下。人家提出的理由就是“我们不会打游击，我们的军队里边知识分子、小青年多，他们没有打游击的经验，你们是老红军，战斗这么多年，有经验，我们不会打呀！到打仗时我们光瞪着眼的挨打，不是光吃亏吗？”当时曹镇东他们有这个想法，就是不会打游击。结果我们没带走他，在这个问题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也失策。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无论对曹五旅也好，六旅也好，十军团也好（高树勋），在这里和我们闹磨擦，在这些问题上有些右倾。这个中央和肖华同志给我们有结论。这个右倾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当时我们只注意统战，团结。该消灭的没有彻底消灭。正因为没有消灭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彻底的打倒他们，所以搞的边区抗战最不力最困难。其他地区不这么困难，最困难的就是冀鲁边，再加上渤海。另外群众工作搞的也比较差。其原因也就是由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参杂着不

好搞呀，边区不能连成一大片，这是我们冀鲁边区。人家冀中就不是这样搞的。吕正操一去的时候，冀中也是一片混乱，日寇全部南下了，后防空虚，沿铁路线交通线，当时也是无政府状态，也是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吕正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一起收拾了。所以他那个部队发展的很快，最后发展到三十多万人。而我们这个地区，跟这个讲统战，跟那个讲关系，最后连土匪和顽固派都到敌人那边去了，这就反映了我们右倾。再比如说，曹五旅在改编过程中沈鸿烈来了，我们应该接受沈鸿烈去乐陵被我们赶走的经验。三八年秋，沈鸿烈派了个县长叫牟宜芝到乐陵去。乐陵当时是我们的根据地，叫牟来和我们搞磨擦。可是牟来了之后和我们搞联合，共同抗日。这就引起了沈鸿烈的重视，他准备亲自到乐陵把牟带走。我党闻讯采取了一系列斗争措施，我参加了那次斗争。先是符竹庭、李启华同志和他谈判，我们提前考虑到谈判不可能成功，准备了另一手，结果很成功，我们胜利了。当时我们发动了一万多人，把沈鸿烈架有机枪和十几辆汽车给围住了，我们不管他，就把他围起来了。是群众硬把牟县长留下了。沈鸿烈回去不是有三大耻辱吗？被我们只有二十来岁的李启华说的目瞪口呆，又被群众包围了，最后他还是灰溜溜的逃走了。五旅改编成洛阳支队之后应该马上把八路军的符号发下去，很简单，只是印一个小牌牌带在胳膊上，沈鸿烈再改编他，我们就和他斗。

说曹五旅和我们的关系以前就是这么个情况，洛阳支队时代投敌后一段，到德平解放以后，我们才正式把他改编的。五旅和我们的统战也就是这么一段情况。总的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右倾的。

〔作者介绍〕李平同志，原名于梅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生，山东省无棣县于何庵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前任无棣县共产党活动分子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无棣县委组织委员，津南特委与山东分局的政治交通，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三十一支队三路政治副主任，庆云县委书记，冀鲁边区二地委组织部长（代号520，尊称二哥），后任济南城市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抗战胜利后患病休养。